

刘醒龙 | 独醒者

当代作家中，刘醒龙以鲜明的题材指向性而卓然不同——他的目光，常投向乡村、县城这种“大都市以外”的边缘地带，《分享艰难》如此，《凤凰琴》如此，《秋风醉了》如此，荣获2011年度茅盾文学奖的《天行者》亦如此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资料

“很多时候，我都觉得自己没有真正意义的故乡、故土和老家……”刘醒龙这样写道。他出生于湖北黄州的地委招待所里，“刚满一岁，父亲就请了两个挑夫，一位挑着我和姐姐，一位挑起我们全家的行李，一步一步走进大别山腹地，在一处名叫石头嘴的小镇上停留下来。”

停留不等于安顿。因父亲频繁调动工作，刘醒龙的童年是在漂泊中度过的，换了多少学校已数不清了。他觉得自己没有一座老屋可以寄放，没有一棵同年同月同日生长的树木作为标记，更没有一块无论走多远都能让内心踏实的土地。

身为作家的刘醒龙不断地书写乡土、书写故乡，很大程度上源自少年时期的漂泊感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家乡，灵魂就无法安顿。

刘醒龙笔下的乡土并不美好。尽管文字是美的，描绘风光和风俗时也是美的，可抵挡不住残酷的现实。这依然和经历相匹配。刘醒龙做过县水利局施工员、阀门厂工人、县文化馆创作员、县创作室主任……仔细观察不难发现，这些地方格局虽小，纠葛却一点也不少，人事纷繁尽在其中。他曾被同事视作“不受欢迎的人”。

挣扎久了，对小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，刘醒龙也有了直观而深刻的体验，下笔为文，充溢着残酷、挣扎和无奈，将压抑的生活和盘托出，有时候令人不知所措。

1992年的《凤凰琴》围绕着乡村教师展开，其直面现实的勇气，博得文学评论家冯牧的赞赏，誉之为“新现实主义”。这也奠定了刘醒龙在文坛上的地位。十多年后，在此基础上他改写成长篇小说《天行者》，描绘了乡村代课教师艰难的“转正”之路，把这群小知识分子的煎熬，写得肝肠寸断。

“作家就是独醒者。”他如是说。

都市与乡村，人与自己的影子

生活周刊：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，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您觉得最大的变化在哪里？

刘醒龙：最大的变化是城市对乡村的歧视变得明目张胆，并且不知羞耻。而乡村的最大变化在于终于明白到这种歧视的存在。

生活周刊：关于乡村的衰败成了社会的焦点，梁鸿、熊培云等学者都有记录，就您自己的观察，觉得原因是什么？

刘醒龙：除了多年政策性忽视之外，另一个原因是盲目发展非农业经济，将有限的资源白白糟蹋不说，甚至还遗祸后代。乡村唯一正确的愿景，应是世外桃源而非其他。

生活周刊：您的不少作品是以小县城为背景的，您认为夹在大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县、镇，目前处于一种怎样的状况？

刘醒龙：最有希望，也最盲目。

生活周刊：我跑过一些县城，深感其中的光怪陆离，比如建筑模仿大都市，不伦不类；很多县城都有“标志性建筑”，等等。很希望听听您讲，县城的整个精神状态究竟是怎么回事，症结何在？

刘醒龙：丢失了小城的闲适安宁，而又达不到都市的夸张奢华。

生活周刊：在您看来，当下的都市人对乡



刘醒龙

1956年生于湖北黄州，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，2011年度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，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代表作《分享艰难》《凤凰琴》《天行者》等。

村是怎样一种态度？

刘醒龙：某个人家正在过着惬意的小日子，忽然闯进一位面目可疑的陌生人。如有表示，客套是真，欢迎则未必。

生活周刊：都市与乡村、都市人与乡村人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？实际情况又如何？

刘醒龙：二者之间就像人与自己的影子。无论各自态度如何，都无法改变。

生活周刊：得到茅盾文学奖后，您曾表示，新作将是一部关于城市生活的长篇，但具体是哪一类人还需要保密，现在能透露一点吗？

刘醒龙：我会写一群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男男女女，这些人现在是社会生活的中坚。

生活周刊：您之前主要精力投射在小县城、乡村，现在为什么要把目光投向都市人群，是什么促使您写他们？

刘醒龙：写作如果没有挑战，就会少许多乐趣。在写惯了乡村之后，再写写城市，肯定会有全新的享受。

生活周刊：您觉得当代都市人处于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？

刘醒龙：大致上还处在一种离真正都市人还有一段距离的“实习生”状态。

生活周刊：普遍认为中国当代的都市人焦虑、浮躁，您认为呢，为什么？

刘醒龙：大概是由于太过看重明天，而忽略对正在进行的生活的发现与享受。其实，只有珍惜现在，才有明天。

好小说，要写出深处的腐朽

生活周刊：您一直被视作新现实主义的作家，如何理解小说和现实的对应关系？在当下，小说与纪实哪一种更有力量？

刘醒龙：文学作品都是面对现实而写作的。举例说，与写腐败的纪实类作品相比，好的小说作品，一定要写出腐败深处的腐朽。

生活周刊：但纪实调查类作品比小说更真实，这个特点会对长篇小说产生冲击。

刘醒龙：小说的意义在于经典。纪实与调查



则强调时效。前者是时间长河，后者如火山爆发。各有不同。

生活周刊：其实您早年也写探索性作品，后来为什么坚持走现实主义道路？

刘醒龙：在内心深处，或者说在文学精神上，我还是一个探索主义者。我放弃了形式上的探索，在精神探索层面上，反而获得更大的力量与自由。

生活周刊：包括您在内，中国作家都偏爱“史诗性作品”，为什么？什么样的作品方能被称为史诗？

刘醒龙：王春林教授在评论《圣天门口》时说了如下一段话，“史诗性”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最高级别的形容词，称道一部作品是史诗，也就是将这部作品置于最优秀的作品的行列。当一部作品具有宏大的规模，丰富的历史内涵，深刻的思想，完整的英雄形象，庄重崇高的风格等特点时，便可能被誉为“史诗性”。

生活周刊：您认为自己的哪一部作品可以达到史诗的高度？

刘醒龙：这不是我说的，但是国内一批著名评论家：吴义勤、施战军、洪治纲、宋炳辉、雷达、于可训、朱向前、孟繁华、白烨等曾如此评价过。

生活周刊：您曾说：“一个好的作家，要有强大的社会担当，要敢于牺牲，敢于放弃，还要耐得住寂寞。”我想追问：作家到底应该是什么？

刘醒龙：合格的作家应当是这个世界的独醒者。

生活周刊：您也说过，文学一旦回归自身，它就会强调艺术性，那么社会担当和艺术性之间，作家如何把握、平衡？

刘醒龙：只要写作者本着良心和良知去做，就能做到。

生活周刊：从80年代的文学热，到今天纯文学相对边缘化，您如何看待这个过程？

刘醒龙：文学并非被边缘化。文学只是回归到其本来所处的位置。一个真的将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会变得很堕落。

生活周刊：面对这样的状况，作家如何安身立命？应该站在什么位置观察这个世界？

刘醒龙：不出卖尊严，笔下要有风骨，始终牢记每个人、每个时刻，都需要重新启蒙。

生活周刊：您为何而写作？您最大的恐惧是什么？

刘醒龙：为内心的安宁而写作。最大的恐惧是落花和流水。当然，也最愿意去理解落花与流水。

言论

Talk

→对作家来说，最考验他的还是想象力。

→我其实是一个很笨的人，我的信条就是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情，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了，这个人可能就是天才。

→小说的好看与不好看，是由小说读者修养来做判断的。读者总是用来完成一部作品最后的创作。博大爱心、厚实积累、人性洞察，是一个大作家必备的三个条件。我想，对于读者，应该也有相同的考验。

→我现在还是一个很卑微的人，我只想做一些能体现我灵魂并不卑微的事情。